

(上接第一版)

以企业而论,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,也在无锡设厂,两地技术相通,人才互动。近代苏州最著名的苏纶纱厂管理者严裕棠,既在苏州办厂,也在上海办厂,在苏州有苏纶厂、苏纶二厂和织布厂,在上海有隆茂纱厂,他还投资过常州民丰纱厂、戚墅堰通成毛纺厂。近代无锡首家纱厂业勤纱厂,其创办人杨宗濂、杨宗瀚兄弟,本来就是上海办纺织厂的。刘国钧在常州创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,赵锦清在常州开设的锦纶二厂,其技术也均与上海有关。

至于上海对江南各地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,几如浓雾罩地,无处不在。从照相机、留声机、自行车、电灯、电话,到西装、西餐、电影、跳舞,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,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。1919年6月23日,《申报》有文章评论说,中国人群当中,上海人在吸收外来之新思想、湔除中国之旧污染方面,最为敏捷。“以人民之活动现象而言,惟上海之人士,其有创导之功能,而足为各省州县所效法也。”细察北京、杭州、武昌、济南等城市,从娱乐设施、城市建筑、报纸版式,到商店招牌、广告用语,随处都能看到效法上海的痕迹,“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”。

对于这类“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”的社会现象,时人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词汇:“上海化”。1925年,《新上海》发表《内地的上海化》,对此有所描述:

上海好似近水楼台,世界的新潮流,总比内地先受一刻儿,因此上海便成了内地企慕倾向的目标,凡是上海有一件什么较为新奇的事,内地总要尤而效之,这就是新名词唤做上海化了。

时论认为,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无锡等地都是“上海化”严重的地方。苏州社会风气日趋放荡,是“上海化”的结果。杭州西湖在改造方面,环湖修筑马路,通行汽车,均以上海为榜样,使得西湖边“格外像黄浦滩”,是将“西湖上海化”,“顿把西湖没在上海化的空气里”。南京商家以廉价、贱卖、放尺、赠品、大减价为名,行推销货物之实,这是典型的“上海化”。无锡因为在工业、交通、商业、娱乐业、文化诸方面全面仿效上海,被人们干脆称为“小上海”。

上海是移民文化的特大熔炉,创造出海派文化

城市本是移民文化的熔炉,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则是移民文化的特大熔炉,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会面,交流,融合。经过交流与融合以后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,自然不等同于各地移民文化的简单相加,而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,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海派文化。对于这种交流与融合,上世纪20年代便有文章予以讨论:

上海仿佛是一只熔化人的洪炉,一切风俗习惯,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,最会熔化人的。但瞧

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,到了上海不须一年,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融化,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,言与行二大条件,都会变成了上海式。至于一衣一履之微,那更不用说了。说也奇怪,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,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,也容易上海化,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,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。(《上海观察谈》,《新上海》,1925年第一期)

对于这种交流与融合,留学法国、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。1934年,他在文章《上海的将来》中,从不同文化的并存、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,认为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,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之一。他描述了上海不论美丑、不论好坏兼容并包的特点:上海破坏了中国的一切,吞噬了中国的一切,什么文化、道德、礼教、法律,在上海都不算事。上海是一座

化会面、交流、交融、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。这种容受力与消化力的存在,便使得上海成为催生新文明的“洪炉”。

曾觉之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国家与种族界限逐渐淡薄、全人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,亦即今人所说的全球化趋势,认为上海城市的这种无所不容的独特性,看似离奇,恰恰成了孕育新文明的温床。

近代上海城市的创新能力特别强

城市人口规模越大,人们互动、交流的机会便越多,创造与创新也越多。产业、人口、资金高度集聚,在市场经济作用下,必然刺激分工细密、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。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,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。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特别能创新的社会原因。城市人口异质程



吴冠中水墨画《江南人家》

五花八门、无所不具的娱乐场,内地的人固受其诱惑,外国人士亦被其吸引,源源而来,甘心迷醉。他认为,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捐细滴、不让壤土的博大胸怀,上海才能成为“一座火力强烈无比的洪炉,投入其中,无有不化,即坚如金刚钻,经一度的鼓铸,亦不能不蒙上上海的彩色”。也正因为如此,上海才能成就其非凡的历史业绩:“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,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,吐放奇灿的花朵,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,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,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。”曾觉之辩证地认为:

上海亦接受一切的美善,也许这里所谓为美善的,不是平常的美善,因为平常所谓为美善的,都被上海改变了。上海自身要造出这些美善来,投到上海去的一切,经过上海的陶冶与精炼,化腐臭为神奇,人们称为罪恶的,不久将要被称为美善了。而且,美丑善恶又何常之有,这不过是事物的两面,美善可为丑恶,犹之丑恶可为美善,人若不信,试看将来!

曾觉之预言,异质文化经过会面、交流、交融,将会产生新的文化,而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

程度越高,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,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,创新速率越大。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,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,这两个特点,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创新能力特别强。

上海创新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生动的例证。商务印书馆能够长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,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断创新,出版内容与时俱进,印刷设备持续翻新,管理制度不断革新。荣家企业能够繁荣发达,关键也在于创新,荣宗敬曾将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设备力求更新。一些从事生产替代进口产品的民族企业,持续不断地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、先进技术以改进国货生产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江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调查,结果发现其中有146家工厂拥有从国外进口的机器,还有8家工厂置备了由上海仿制的外中机器设备,只有39家工厂仍只采用中国的旧式设备。与外埠相比,上海企业的设备往往较新也较先进。争优创新的结果,必然是优胜劣汰。1912年至1927年,上海新开设的工厂企业至少有1194家,但到

1927年底,实在开工的只有795家,仅占这15年间新开工厂数的66.6%。也就是说,这些新开设的工厂,至少已有三分之一已经在激烈的竞争中停工歇业。

穆藕初从美国留学归来,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,由一介书生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棉纺织业巨子,很关键一点,在于他创新。他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企业,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。作为近代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,陈光甫的成功之道也在于创新。他在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,特别注重吸收不为其他银行所重视的小额存款。结果,从区区七八万元资本、人员仅七人的规模起家,不数年间就声誉鹊起,到1935年已成为拥有500万元资本、40多家分支行的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。

近代上海优秀企业得益于创新,文艺方面(绘画、戏曲、音乐等)、饮食方面、服饰方面无不如

荣宗敬、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,不光是管理人员,普通员工亦多为无锡人。湖南籍的聂缉槩、聂云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,员工多为湖南人。安徽籍的孙多鑫、孙多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,员工多为安徽人。这类情况在上海极为普遍。这使得上海的市场,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,各占一摊,各销其货,各营其业。这也使得上海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,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,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,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。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,在赈灾活动、拒俄运动、抵制美货运动、五四运动、五卅运动、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马当先。上海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公共空间、报纸、电台,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,当其他地方发生了事情以后,上海行动起来就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。比如说最著名的抗日歌曲、剧目,如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,大多是在上海产生,而不是在东北产生的,原因就是上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。早在1930年,徐国桢已经清晰地论述过“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”的社会根源。(《上海生活》,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)

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,对于上海人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,具有特别的刺激作用。一方面,日常生活中,西方人主导的租界市政建设先进、整洁、卫生,中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、逼仄、肮脏,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,刺激中国人见贤思齐的爱国情感。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即由此兴起。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,四大公园(外滩公园、法国公园、虹口公园、兆丰公园)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华人入内。日常生活中,华人备受歧视。比如,马车在道路上行驶,租界明确规定华人车辆不能从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马车。租界华人长期只有纳税义务,没有参政权。诸如此类,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。另一方面,1932年的一·二八与1937年的八·一三两次日本侵沪战争,直接轰炸、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,而租界则基本完好。华界与租界,没有天然屏障,只是一路之隔、一河之隔。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、屠杀,就发生在国人眼皮底下,近在咫尺。这种被辱、挨打、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,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,是任何远距离的纸质、广播宣传都无法比拟的。

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独立、自由、务实、自强、法治、爱国等特点,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、集聚、融合、创新,使得海派文化变得更为突出、耀眼,更具近代特性。所以,我们可以说,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,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,以江南人口为主体,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(包括岭南文化、八闽文化)因素,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、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。

近代上海人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

近代上海在思想方面的创新,很突出一点,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。

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、持久而密切的联系。福建人经营的茶叶、木材大多来自福建,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来自山东。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,主要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。上海很多企业优先录用本乡人。广东中山人开办的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等四大公司,其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广东。